

中国文化  
语言学丛书  
主编/申小龙

■申小龙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当代中国语法学

在西方语法学的规范下难以认清汉语的文化特征  
是中国现代语法学迷惘和危机的症结所在。

当代中国语法学必须走人文科学  
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

中国语法学与世界的对话基础是功能主义  
而不是形式主义。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主编·申小龙



# 当代 中国 语法学

申小龙·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语法学/申小龙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申小龙主编)

ISBN7—5406—3217—8

I . 当…

II . 申…

III . 现代语法—汉语—中国

IV . H146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

**当代中国语法学**

**申小龙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50000 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8000 册

ISBN 7—5406—3217—8

H · 35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提 要

中国现代语法学，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革新志士的一种文化选择。在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优势面前，奋起进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志士仁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近代工业革命中盛行于西方的单线进化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科学主义思潮，由此建立了以“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语法学范式。这一范式建立伊始，就因其与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深刻的冲突而受到一代又一代语法学者的怀疑、反思和挑战。尤其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三次语法革新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反映出中国语法学日渐清晰的民族文化自省意识，当中国语法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面临又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候，汉语语法从本体论到研究方法论的全面更新已是一股无法回避的历史大潮。

从本体论上来看，文化语言学者首先提出了汉语语法结构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文化通约性的大胆假设，并从句型、句法和词法等角度作了充分的论证，这一探索的意义在于，它用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的深层规定，取代了以往以印欧语语法样态为纲的浅层规定，以深刻的个性思维代替了便捷肤浅的“共性”思维，从而为科学地认识汉语的组织形式和规律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途径。由于汉语语法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人文精神，从文化理据入手把握汉语结构样态也就有很强的解释力。

从方法论上来看，文化语言学者首先提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

人文科学方法论，并对自60年代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浓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科学主义宗旨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语法研究的人文科学方法要求在对汉语语法结构作“文化认同”分析的同时，在技术操作上持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语言单位的意义、功能、环境、韵律对于确定单位的性质和形式的重要性，把文化认同、功能体认和综合分析作为汉语语法分析过程中有机统一的三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根本上解决汉语语法研究“貌合神离”“畸型繁琐”的痼疾。

当代中国语法学的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古代语法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阐释和发展，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冲击和改造下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文化语言学者首先提出了中国语法学传统的现代意义这一命题，并对传统的文化特质、阐释形态、词类系统、句法哲学作了深入的探究。

本书的研究贯穿着文化语言学对当代中国语言学的独特视角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Grammar was a cultural choice of the Chinese reformers with lofty ideals at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Fac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Western 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 of “strong fleet and powerful gun”, the Chinese with lofty ideals, who advocated the policy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unhesitatingly accepted the evolutionism, the ideas of the cultural centricism and scientism which were prevailing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and set up the mode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following “the rules of the Western languages” as its main character . Since the mode conflicted violently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it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 the Chinese grammarians , one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 , suspected ,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it. Especially in 1930's , 1950' s and 1980's , Chinese grammar reform waves reflectes the Chinese grammarians'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self-questioning. 1990's , the turn of the 21th century witnesses an irresistant historical big tide of overall renewal of the Chinese grammar , from ontology to research methodology.

Onotogically , the cultural linguists first put forward the bold hypothesis : the Chinese grammar structure has cultural “common divisor” with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one. And they have

expounded and proved it from the angle of sentence pattern, syntax and morphology. This discovery signifies that the deep-level prescrip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thinking method replaces the surface prescription of Indo-European grammar mode which was used as a guiding principle; profound individual thinking replaces the superficial “general” thinking ,then opens an unprecedented new way to understand scientifically the structural forms and rule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very strong explanation power in grasping the Chinese structural forms starting research from the cultural theory because the Chinese grammar itself has strong humanism.

Methodologically, the cultural linguists first suggested the scientific humanistic methodology and had a profound criticism of the formulistic and scientistic tendency prevailing since 1960's. The scientific humanistic methodology of grammar research requires that we analyse “the cultural acceptance” of the grammar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technical operation, with a humanist attitude, we must fully 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aning, function, situation, meter of a linguist unit in determining the unit's properties and forms. Taking cultural acceptance, function re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s the three integrated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methodology in analysing the Chinese grammar solves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seemingly in harmony but actually at variance ” and “overlaboration” in the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is essentiall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tradition in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is a creative transform of the remold of the tradi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linguist theory . The cultural linguists first put forward the topic of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grammar tradition and had a deep study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erties , pattern of interpretation , system of part of speech , syntactical philosophy.

This book reflects unique point of view and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duty of the cultural linguists i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英译：邝嘉敏)

##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

申 小 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语言文字的研究与革新曾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冲突、震荡的先导，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之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热潮中，语言的研究与革新将再次拉开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序幕。站在这个新世纪的起点上，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跨世纪的一代，适时地回顾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努力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选择和建树新的理论、方法乃至文化哲学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它是在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船坚炮利”的“优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开始现代化的，由此形成这样一种研究规范：

其一，它不由分说地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范畴和体系，未曾考虑这些范畴、体系和方法源出于与汉语很不相同的印欧语。根据现有的语言资料，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形态、组织方略和文化精神上分别处于人类语言连续统的对立的两极。

其二，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形式化宗旨，把形式化作为语言分析的终极目的，未曾考虑汉语没有印欧语那种丰满、裸露的形态标记，汉语的析解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更未曾

考虑语言分析的终极关怀不是形式，而是内容。

这样一种研究规范使曾与中国文化血肉交融在一起的传统汉语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异化，即它不再以使用母语的人与文化为目的，而以某种理想化的形式为目的；不再以汉族人的语感作为建立范畴的深厚基础，而力图以西方语言的“科学”范畴来规范汉族人的语感。这样一种研究规范，在其长足的发展中，必然伴随着语文感受、文化心理的矛盾冲突与困惑。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文化断裂的深刻代价。

鉴于对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反思，我们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突破西方语言理论框架，寻找、实践一种与汉语的文化性特征相适应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设立了两个科学的参照点：

一、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美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这种通约性使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其他样式入手反观汉语的建构特点，从较深的层次上把握汉语的文化性特征，以此规定汉语的整个结构蓝图。

二、中国古代语文分析传统中所运用的范畴和方法。这些范畴和方法贴近中国人的语感，在加以科学地整理和阐释后，能够转化为现代汉语分析的基础。

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文化语言学。近年来，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以汉语的人文性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特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与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的新语言学范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大批中青年语言学者正以崭新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为了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学科系统地阐述语言学新范式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奠定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我们撰著和出版这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这既是一套中国语言学各领域的学科建设丛书，也是一套中国语言学各领域的理论、方法探索丛书。丛书中的每一本因学科

对象和作者专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和重点，但基本上循着这样一个大思路：

首先是对该学科在 20 世纪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其次揭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从而树立新语言观；

再次是重新认识和阐释该学科在中国古代语文传统中的研究范畴、方法、理论，揭示其现代意义；

然后系统论述该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以丰富的材料对新方法加以实证；

最后展望该学科在 21 世纪的前景。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走向新世纪的时刻，能够在语言学的十个主要学科——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理论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学史学——形成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大思路，充分说明中国语言学的新规范正在中国年青一代语言学者的勤奋探索中孕育成长。本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必将为中国语言学划出一个时代。

本丛书的撰写邀请全国各高校中卓有建树的中青年语言学教授、博士参加。这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运用人文科学的语言和方法，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就。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语言学者，如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王力、陆宗达、罗常培、季羡林、吕叔湘、张志公、裘锡圭等的思想和传统，而且以自己新的理解和阐释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

本丛书荣幸地聘请著名前辈学者季羡林、张志公和许威汉先生担任顾问。他们对丛书的思路给予热情的肯定，并给我们以深刻的指教。季羡林先生对我们说：“汉语研究几十年来陈陈相因，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用中国文化的眼光看待汉语。”“一个民族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一切精神文明（甚至一些物质文明）生产的基础，它必然表现在各个方面。”季先生指出：

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重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

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sup>[1]</sup>

季羡林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我们这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语言学者在这一点上有深刻的共识。何容先生指出：“自《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文法学，恐怕大部分通则，甚至整个的基础，是用演绎的研究法建立起来的。”“是把欧洲语言里的文法里的通则，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sup>[2]</sup>王力先生指出：“现在我们天天谈汉语特点，天天还是在西洋语法的范围内兜圈子。必须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然后不至于被压在五行山下。”<sup>[3]</sup>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指出：一个世纪以来，“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洋框框）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型的方向发展。”<sup>[4]</sup>张志公先生指出：“我们的语法学至今很不成熟，主要缺点是不完全符合汉语特点，或者说，基本上不符合汉语特点。”<sup>[5]</sup>“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者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sup>[6]</sup>陈望道先生说得更为概括：“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sup>[7]</sup>而季羡林先生的论述，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汉语研究这种缺陷的文化根源。他以一个东方文化学者的慎思明辨提出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现代意义，并充分肯定了文化语言学的运思方向。正如他与我交谈中所说：“用中国文化的眼光看待汉语，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是为了世界。东方文化一定会将人类的文化提到更高的水平。”

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语言研究中的文化语言学大潮，本质上是东方语文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是历经“分析的时代”的中国语言学走向新的生命的一场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并已连续六年召开全国文化语言学讨论会。日本中国语学会和东京大学等高校也邀请我讲学。我深切感受到这场变革对于东方各民族语文传统寻求健全的现代转型的深刻意义。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不是为西方语言理论提供一个东方语言的例证（即使是作了很 大理论修改的例证），而应是以对中国语言具有永恒意义的语文精神的现代阐释，去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责任编辑姚自力、潘英伟先生对丛书及其作者的深刻信任令我们感动！两位先生曾与我专程在上海和北京拜访丛书的顾问和其他专家学者，充分论证选题，并在广州和襄樊先后两次召开全体作者会议，讨论撰写中的具体问题。正是在他们的促进下使这一宏大的科研、出版计划得以实施。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他们暨广东教育出版社表示深切敬意！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又过万重山！我们这一代学者从“上山下乡”中走来，将以自己不折不挠的毅力、创造精神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告别 20 世纪。新的世纪将是人类文化在新的历史层次上更为绚烂而非简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正像我为日本东京大学的题辞所言——

“东方语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

1993 年 9 月 12 日

#### 注释

[1] 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

[2] 何容《中国文法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3] 王力《语言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载《中国语文》1956年第10期。
- [4] 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载《复旦学报》1980年语言文字增刊。
- [5] 张志公《闲话语言》，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1期。
- [6] 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载《教学语法论集》。
- [7]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 目 录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	申小龙
<b>第一章 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历史反思</b>	1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中国现代语法学的诞生	1
第二节 中国语法革新初潮（20世纪30年代）	22
第三节 中国语法革新二潮（20世纪50年代）	39
第四节 中国语法革新三潮（20世纪80年代）	52
第五节 汉语语法学方法论递嬗及其反思	106
<b>第二章 汉语语法的文化内涵</b>	126
第一节 汉语语法的文化形态	126
第二节 汉语句型与汉民族世界观	142
第三节 中西语法的心理差异	163
<b>第三章 中国语法研究传统的现代阐释</b>	184
第一节 汉语语法学传统的文化特质	184
第二节 汉语语法学传统的“训诂”范式	200
第三节 汉语语法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247
<b>第四章 当代中国语法学的人文科学方法论</b>	277

第一节	汉语语法分析的基本原则	277
第二节	文化认同的方法	291
第三节	功能体认的方法	309
第四节	综合分析的方法	343
<b>第五章</b>	<b>世纪之交的选择：中国语法学前瞻</b>	369
第一节	汉语语法本体论的人文主义选择	369
第二节	汉语语法方法论的功能主义选择	383
<b>关键词索引</b>		402
<b>后记：我的语法研究道路</b>		408